

美国当代女作家安妮·泰勒



二十世纪美国南方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主题

李美华

美国南方文学一般是指由在南方长大的作家写的关于南方的文学作品。从地域上来说,对美国南方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美国南方包括三个地区:南部沿海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地区,主要是贵族阶层;以红土地为特征的山麓地区,包括农夫和蓝领工人;集工业、采矿业和旅游业于一身的南方山区。另一种看法认为,美国南方是指沿海从墨西哥湾起往北,包括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卡罗莱纳州、弗吉尼亚州直到马里兰州的地区。美国南方文学注重对南方地方特色的描写,有很强的地方色彩。作品中强调家庭、社区、宗教信仰、时间和地点等概念,并对历史、人性的局限等加以揭示。在创作中,南方特有的声音和方言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长期以来,南方文学总是被理解为白人男作家的作品。其他族裔的作家和各族裔的女作家几乎都被排斥在这一文学派别之外。虽然也有为数极少的女作家偶被提及,但她们全都是白人,而且她们的作品几乎都是描写南方上流社会的作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开始把黑人作家写进了南方文学史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学越来越受到评论家们的关注,地位随之提高的是各族裔女作家的作品。在南方文学中,不管男作家还是女作家,不管是白人作家还是黑人作家,不管是出身上流社会的作家还是出身微贱贫寒家庭的作家,他们之间虽然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他们同是南方社会的一员,这

一共同点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就跨越了种族、跨越了社会阶层、跨越了地域,构成了独特的南方文学。

美国南方女作家一直是美国南方文学中的一支生力军。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到六十年代,许多女作家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当时发表的作品主要以支持蓄奴制的浪漫小说和伤感小说为主,而读者群也主要是女性。卡罗琳·吉尔曼、卡罗琳·亨茨以及 E. D. E. N. 索思沃思等都是这一时期颇有名气的作家。但十九世纪的南方女作家中最有影响的还是凯特·肖班。肖班的作品写的是上层社会和中上层社会的女性、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们所受到的性别和种族方面的压迫。她在一八九九年问世的小说《觉醒》讲述了女主人公埃德娜性的觉醒以及她为寻求身与心的自由所做出的努力的故事。小说中,她试图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努力不但没有获得成功,反而让她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女权主义浪潮的再次掀起,《觉醒》已经成了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女性文本。

到了二十世纪,南方女作家继续根植本土文化,创作出一部又一部既有地方特色同时又跨越了地域性的作品。分属不同族裔、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南方女作家,纷纷在作品中展示南方女性特质,也就是说,她们在作品中给南方女性以新的定义。尤多拉·韦尔蒂、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佐拉·尼尔·赫斯顿、艾丽斯·沃克、安妮·泰勒等都是成绩斐然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家的创作中,她们并没有全然摒弃旧有南方女性定义中有价值的成分,而是在保留有价值成分的同时对这一定义加以修改和补充。于是,家和家庭对女性的重要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南方种族问题、女性角色被淡化的现象以及女性和南方土地之间的关系等等,成了南方女作家们的关注点。她们试图通过写作,把自己作为女性的形象清晰地展示给读者。她们讲述的不但是她们自己的故事,而且也是她们的母亲和祖母的故事。通过这些

故事,女作家们重写了南方的文化史,让那些过去被迫沉默的人的声音终于清晰地发了出来,为南方女性在南方文化中争取到了应有的空间。

家在美国女作家的小说中是个一再出现的意象,而在南方女作家的小说中,这一意象更是特别普遍。南方女作家强调家及家庭对女性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女性的创造力和女性的声音,这一点甚至冲淡了种族、阶层和地域的界限。这些女作家通过她们和家庭中其他女性的关系来理解自己,并且重新给家下了个新的定义。家是女性生活的轴心,也是女性各种活动的最重要的场所。在家对女性的重要意义方面,佐拉·尼尔·赫斯顿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小说《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贾尼逃离家庭给她带来的压抑的故事。故事开始,对贾尼来说,有两个家,一个是她祖母的家,它坐落在祖母为其工作的一个白人家庭的后院里。另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家。然而,在这两个家中,贾尼都觉得很压抑。后来,贾尼嫁给了第一任丈夫洛根,于是便有了自己的家。然而,这个家同样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贾尼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终于和视野较广、观念没有被家的围墙封住的乔迪私奔了。遗憾的是,尽管乔迪比洛根强,而乔迪也为她提供一个相当大的家,但贾尼还是感到很压抑。乔迪死后,尽管贾尼继承了乔迪的遗产,但住在一个偌大的家里,守着乔迪的遗产度日,贾尼感到难过极了。寂寞和孤独使贾尼经常在夜里伤心落泪。她终于意识到房子的大小和财产的多少并不能决定一个女性的生活能否幸福。直到贾尼爱上了蒂·凯克,她才得以建立了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家。在这个家中,她没有受到限制,相反,她感到有了自己的力量。虽然蒂提供给她的是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家,但她找到了能释放自己情感的场所。她和蒂真诚相爱,他让她体验到了真正的性快乐。而他们的家经常宾客盈门,贾尼既可以听别人的故事,高兴的话还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她心情愉悦、心甘情愿地为

丈夫做饭洗衣,用各种方式表示她对丈夫的爱。而蒂也以自己的方式回报贾尼的爱。这个家成了贾尼生活的中心,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贾尼。通过贾尼几次三番地从一个家逃到另一个家,赫斯顿表现了贾尼作为女性寻求自己真正自我的历程。幸运的是,贾尼成功了,最终获得了作为女性应有的自我和尊严。

南方女作家的小说多以女性为中心,以不同的方式对南方女性经验进行了充分的阐释。虽然她们并不否认男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但她们往往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家庭中的女性身上。女性充沛的创造力、女性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女性与女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她们的作品表现的侧重点。在她们作品中,有些家庭其实可以称之为以母性权利为中心的家庭。尤多拉·韦尔蒂的《三角洲婚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讲述的是费尔查尔德家族的故事。故事围绕着家族中的女性展开。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不但通过女性对房子的拥有权表现出来,而且也通过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表现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费尔查尔德家族中女性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这个家族本身,而是辐射了家族之外的整个三角洲地区。小说对女性的婚姻、怀孕、分娩等都有叙述,而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创造能力、不同女性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跟土地的关系也得到了充分表达。韦尔蒂以和赫斯顿不同的方式叙述了家对女性的重要性以及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重要性。

美国南方文学中不可避免的另一母题是白人和黑人的种族关系。种族问题实际上是南方之所以为独特地域的决定性因素。在南方,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的联系异常紧密。虽然她们同样受着南方男权社会的欺压,但大多数白人女性并没有和黑人女性形成一致的同盟,她们对黑人女性的情感往往是很矛盾的。她们很少意识到或者承认她们的黑人姐妹其实也是人,也有一样的人性。她们不但鞭打她们,而且瞧不起她们,很少把

她们看成是同样拥有自我的个体的人。虽然女性同样被看成是私有财产,但白人女性比黑人女性在经济上富有得多,地位也高得多,而黑人女性却跟拍卖会上的牛马差不多。

美国内战的结束宣告南方蓄奴制的终结,但是,南方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而结束,反而在整个重建过程中一直延续着。进入二十世纪,这种紧张关系继续存在,直至二十世纪后期。黑人女性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自由,却继续为白人女性服务,通常是作为家庭的佣人。虽然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互有怨恨,但一些白人女性开始意识到,作为女性,她们其实受到了同样的压迫。她们开始明白,在和南方男权社会作斗争的过程中,她们必须联合起来。当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风潮已过,许多南方女性开始赋予南方女性以新的理想。只有这时候,南方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才可能打破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设想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过去没有被发现的友谊。

埃伦·道格拉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开始写作,至今已出版八部小说。道格拉斯的小说关注的是当代社会的问题,而南方种族关系是她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她实验性的叙事方式,以及她近期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活力,使她成了受到瞩目的当代南方女作家之一。道格拉斯生长的社会是个种族观念特别强的社会,但她属于南方殷实的从而也是受到保护的南方白人社会。她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涉及了种族问题,特别是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不能离开你,宝贝》。在这部小说中,她讲述了一个白人妇女科妮莉亚·奥凯利和一个黑人妇女朱莉娅·卡丽之间的友谊。小说关注的是使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隔离开来的障碍,她们之间早已发展起来却还未被承认的相互关系,以及她们为了建立相互间有意义的友谊而不得不经历的痛苦的历程。最后,虽然她们两人找到了认可他们之间的友谊、痛苦以及怒意的方式,但道格拉斯的小说仍然暗示了她们还是分属白人妇

女和黑人妇女两个不同的族群。她们两人虽然被置于绝然相反的社会地位,但她们之间还是有着某种联系。事实上,绝然相反的社会地位反而把她们更紧地连在了一起:因为她们都同样受到南方还在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男权主义的压迫。她们必须暗地里寻求相互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并未得到公开表示,只有在亲属去世或者面临其他危机时,她们才会主动帮助对方。

南方特有的历史也是南方女作家关注的焦点。一些女作家把南方特殊的历史融进小说创作当中,把一些属于私人和个人的东西展示在读者面前。南方的蓄奴制以及美国南北战争都在南方女作家的小说中得到了尽情的表现。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就是很好的例子。当代女作家在这一方面也不示弱。著名黑人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及艾丽斯·沃克都在她们的小说中对蓄奴制和南北战争有所叙述。虽然不同的作家叙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她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认为南方女性应该了解她们的历史——她们家族的过去、地区的过去以及从总体上来说的女性的过去——以达到对自己的更深刻的了解,从而给自己一个新的定位。也就是说,她们认为重现历史能够使南方女性更好地了解她们过去的文化,使她们在当代南方社会为自己找到更好的、更满意的位置。丽塔·梅·布朗在她的小说《傲慢的心》中就试图再现美国南北战争,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对当时的历史加以理解。对布朗来说,那段历史不能只简单地通过白人男人的行为来定位,而女性和黑人在那段集体经历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布朗认为,当代南方人必须记住南北战争中所发生的事。遗憾的是,布朗在刻画白人女性获得成功的同时,对黑人女性的刻画却逊色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在白人女作家对南方男权社会对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发出责难的同时,一些黑人女作家还针对黑人内部男性对

女性的欺压,写出了大量感人而深刻的作品。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就是这样的作品之一。虽然沃克也描写了黑人男人压迫黑人社区其他成员的故事,但她的侧重点却是黑人男人对黑人妇女的虐待和凌辱。然而,沃克把萨莉的故事演绎成南方黑人社会寻求精神解放和对南方这一大家园表示妥协的寓言故事。南方成了黑人意念里的家园。在把南方当作整个黑人族裔的大家园这一点上,沃克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作家。

从叙事角度分析,在南方女作家的作品中,讲故事似乎成了很突显的一个特点。从凯特·肖班到尤多拉·韦尔蒂,谈话在她们的小小说中所占的成分都很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谈话,不论是发生在花园或是公园里,在路上还是火车上,特别是在厨房里的谈话,都在描述女性之间的友谊和相互理解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在很多男作家眼里,女性的谈话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女作家的作品中,女性在把自己的故事讲述给他人听的同时,却也在理解这个她们生存在其中的世界。凯·吉本斯在她的小说《梦的治疗》中描述了女性通过互相之间的谈话编织了一张由女性经验构成的无形的网。女性利用这一张网搅扰控制她们的男性,从而为自己的生存条件下了个明确的定义。可以说,这是一张抵御男权欺压的防御之网,为女性的声音创造了一个表现的空间。

二十世纪是女作家创作特别活跃的时期。跟其他地方的女作家相比,美国南方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有其自身特殊的创作背景和关注焦点。对家和家庭的关注、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的关系、对南方历史的重现以及独特的讲故事的叙事风格等等,都使南方女作家的创作自成一体,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这或许正是南方女性文学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

(李美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 361005)